

美朝野乱象丛生众议长选举陷僵局

□ 王一同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8日举行议长选举第二轮投票。共和党议长候选人吉姆·乔丹和民主党议长候选人杰弗里·史密斯未能获得当选所需的最低票数，选举再次无果而终。乔丹表示，他还会推动展开第三轮投票。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多轮选举，美国众议长依然“难产”，众议长之位空缺也使得美国会依旧处于瘫痪状态。此事件暴露出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未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极端对立、两党内部意见撕裂的政治生态问题或将进一步恶化。

选举波折重重

在当前的美国众议院中，共和党占据221个席位，民主党占据212个席位。按照规定，在众议院全院投票中需要获得超过217票才能当选议长。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18日举行的议长选举第二轮投票中，乔丹获得在场221名共和党议员中的199票，杰弗里·史密斯获得在场212名民主党议员的全票支持。两名候选人所获票数均未达到217票，未能选出议长。

17日，在议长选举首轮投票中，有20名共和党议员未投票支持乔丹，令美国各界意想不到的，在第二轮投票中，未投票支持乔丹的共和党议员人数不降反增，升至22人。这意味着乔丹离众议长之位更为遥远。

与之相较，在两轮投票中，在场212名民主党议员一致把票投给杰弗里·史密斯，使得后者两轮得票数均为212票。不过，他依然无法获得当选议长所需的票数。

当地时间19日，美国共和党内部举行了持续数小时的闭门会议，乔丹在经过两轮投票失利后表示，他仍将继续争取获得支持，以赢得众议长一职，并且将会推动展开第三轮投票。

不少媒体和民众发出这样的疑问：美国会众议长选举为何三番五次陷入“难产”僵局？

自前众议长麦卡锡10月3日黯然下台后，共和党11日通过党内投票推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为众议长候选人，然而难以平息党内反对声浪最终导致斯卡利斯12日选择退选。

13日，众议院共和党人又举行闭门会议，推举赢得党内提名的乔丹参选众议长。尽管乔丹最初信心满满，但共和党内多位议员的反对声音令他无法获得赢得众议长之位的最低票数。

作为共和党中的极右翼保守派议员，乔丹获得了党内极右翼势力的支持，但多名党内温和派议员则对此表示反对。

分歧难以弥合

美国媒体指出，距麦卡锡3日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投票罢免的众议院议长已过去多日，这一职位依然空缺，原本以为只是“走过场”的议长选举却演变成了一场两党间以及共和党内部的“激烈摊牌”。

没有支持乔丹的共和党人给出多种理由，包括认为乔丹的政策主张影响其选区选民福利，不愿因支持乔丹而影响自身选情；不愿屈从于高压而随大流投票；担忧乔丹作为共和党籍前总统特朗普铁杆盟友，至今不承认特朗普2020年输给现任总统、民主党人约瑟夫·拜登，由乔丹出任议长恐在明年大选周期引发麻烦等等。

把票投给斯卡利斯的人则暗示，斯卡利斯被迫退选是因为乔丹及其强硬保守派盟友不愿给予支持。

由于党派内斗激烈，几位众议院资深共和党人甚至发出这样的质疑：若无民主党人帮助，党内是否有人能赢得当选议长所需的217票。

路透社就此指出，目前的投票结果凸显出在美国



图为吉姆·乔丹离开众议院时就众议长选举接受记者采访。

CFP供图

众议院，共和党仍处于群龙无首、分歧难以弥合的状态。

美联社则认为，众议院议长选举表决无果显示今后还会有更多混乱。

众议院议长是美国政坛“三号人物”，排位仅次于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一职务对众议院议程的设置和主持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议长职位一旦空缺，就意味着控制立法和拨款大权的众议院陷入瘫痪

状态。

可以肯定的是，在正式选出一任议长之前，众议院无法推进立法议程。

不过，众议院却必须在11月中旬的最后期限内完成多项拨款法案的工作，否则将再次面临政府“关门”的后果。

迫于无奈，部分议员提议通过决议给予众议院临时议长麦克亨利更大权力，以便可以通过法案。

政治严重极化

在众议长“难产”的过程中，美国政坛乱象迭出。据《纽约时报》报道，由于乔丹没有足够的选票赢得议长选举，因此其支持者发动了一场“网络施压活动”，在网上公布那些反对乔丹的“顽固派”议员名单及其电话，号召追随者们给这些人打电话，施压他们支持乔丹。

《华盛顿邮报》则爆料，一些极右翼共和党保守派试图修改匿名投票规则，吓退乔丹的反对者。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政治已经严重极化，不仅两党之争势如水火，党内各派别意见也深度撕裂，由此导致美国朝野乱象丛生。

难怪《纽约时报》日前发文感叹，在一个政治分裂的时代，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国内乱局。

美国半月刊杂志《纽约书评》刊文称，美国已是“两国之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领导两个尖锐对立的国民群体，各自形成一个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已成为“美利坚分裂国”。

路透社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客因快速党派斗争而无法正常履职，47%的受访者认为，在两大尖锐对立、共和党内斗激烈的背景下，国会已无法履行基本立法职能以保障联邦政府正常运转。

美《大西洋月刊》发文指出，美国“陷入了‘民主倒退’的困境”。

分析人士指出，作为美国两极分化的党派政治的一部分，“功能失调和混乱已经融入美国政治血液”。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功能失调”绝不会因为新议长的产生而终止。

而且，美国党派之争，党内意见撕裂以及由此产生的国会运转效率低下、国会与政府相互扯皮等问题，非但在短期内看不到缓解迹象，反而会因总统大选的临近愈演愈烈。



10月10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龙山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要严厉打击青少年非法赌博。

CFP供图

青少年涉赌问题已成韩国社会痛点 尹锡悦要求设跨部门小组严打

□ 本报驻韩记者 王刚

近年来，青少年非法赌博激增成为韩国社会的痛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过去6年，韩国青少年网络赌博上瘾人数激增两倍。由于青少年网络赌博往往涉及毒品贩运、电信诈骗、偷盗、抢劫等关联犯罪，韩国总统尹锡悦近日作出指示，要求设立由法务部牵头的跨部门工作小组，严打青少年赌博及其关联犯罪。

涉赌人数令人震惊

近日，尹锡悦在首尔龙山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指出“面向青少年开设网络违法赌场是侵蚀国家未来的恶性犯罪”。

据韩联社报道，近期一项调查显示，19万余名韩国中小学生在网络赌博中上瘾。这一数字本已令人震惊，更令人咋舌的是，韩国青少年赌博上瘾者总数已超过10万人。

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国会议员金承洙10月18日公开了从韩国“赌博问题预防治疗院”获得的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3年8月，韩国因赌博成瘾接受治疗的人数（问题赌徒）高达101611人，其中7880人年龄介于10岁至19岁。今年1月至8月，因赌博成瘾接受治疗的青少年人数为1406人，与去年全年总数（1460人）相当。这说明韩国青少年沉迷赌博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

10月11日，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委员、共同民主党国会议员徐东龙在健康保险审查评估院获得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使用医疗保险治疗赌瘾的青少年（19岁以下）人数为111人，与2017年的39人相比有大幅增加。

事实上，韩国染上赌瘾的青少年人数已连续多年上升。与此同时，与青少年赌博相关的咨询量也在不断增加。

对此，徐东龙表示，韩国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接触非法赌博，而且他们往往轻视其危害。因此，韩国教育部等机构必须与警方共同努力，防止青少年染上赌瘾，进而因深陷赌博涉嫌毒品贩运、电信诈骗、偷盗、抢劫等关联犯罪。

首尔地方警察厅10月18日公布消息称，今年1月至8月，首尔警方共查处青少年涉赌案件23件，约相当于去年同期（8起案件）的三倍。此外，还发现因筹集赌资而引发的校园暴力、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的案例。

网络诱导成主因

韩国东国大学警察管理系教授郭大庆分析称

为：“青少年缺乏经济观念，对社会的认知也比成年人差。一些青少年认为赌博可以轻松赚钱。同时，还有不少青少年赌博是为了融入同龄人群。”郭大庆指出，当青少年染上赌瘾时，不仅与周围人的关系会恶化，甚至可能陷入为了筹集赌资不惜犯罪，再把犯罪所得用于赌博的恶性循环，长此以往将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

尹锡悦近日不无担忧地表示：“通过网络视频、游戏、社交平台等方式诱导青少年线上非法赌博正在破坏韩国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和未来。”

正因如此，尹锡悦近日在龙山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一再强调青少年赌博的严重性及其危害。

尹锡悦同时强调，部分青少年为偿还赌债借私贷，甚至牵涉毒品贩运、电信诈骗等犯罪，情况已经十分严峻。韩国政府急需采取措施，严厉打击涉青少年非法赌博。

尹锡悦指示韩国警方严查并严打青少年非法赌博及其关联犯罪。与此同时，他还指出，屏蔽非法网站、开展心理咨询等跨部门合力应对也非常重要。

为此，尹锡悦要求韩国法务部牵头，联合教育部、保健福祉部、放送通信委员会（广电委）等多个政府部门，迅速成立防止、打击青少年赌博的跨部门工作小组。

急需专业监控人员

韩国媒体及民众对于尹锡悦政府表态将严打涉青少年非法赌博表示欢迎，但对即将成立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能否起到预期作用不乏担忧。

究其原因，当前韩国防止非法赌博的人力和预算严重匮乏。

韩国“博彩业综合监督委员会”10月18日向韩国国会提交的数据显示，该委员会负责打击线上线下非法赌博的工作人员目前只有11人（监察专家1人，在线监察员6人，现场监察员4人）。

近年来，相关工作人员数量长期不足，仅曾于2019年增加1人，至目前的11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近5年，韩国非法赌博涉及金额突破100万亿韩元，查获的线上线下赌博案件多达12万件。不过，防止非法赌博的相关预算去年仅为6.6亿韩元，今年甚至减少至5.6亿韩元。

韩国“博彩业综合监督委员会”表示，随着非法赌博网站的信息化、智能化日新提升，目前急需专业的监控人员。



检察界的“联合国” ——访欧散记之一

□ 李永君

日前再访英伦，跟随中国检察代表团，参加第28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大会。几天时间，会上会下，对国际检察官联合会有了进一步了解。从名称到职能，它相当于全球检察界的“联合国”。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英文名称为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secutors，简称IAP。为了便于表达，中文不妨简称为国际检联。它成立于1995年6月，目前包括177个国家和地区的183个团体会员，以及30多万名个人会员。国际检联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暨会员大会，会员大会选出由30名委员组成的执委会。执委会委员中，再选出副主席7名，副主席当中，再选出主席1名。执委会相当于领导班子，由主席、副主席和普通执委组成。主席、副主席和执委任期三年，到期改选，随缺随补，最多可连任一次。目前，国际检联主席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检察院检察长胡安·巴蒂斯塔，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部长董建明为副主席之一。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检察长叶卫生为执委会委员。

国际检联日常工作由秘书长主持。他虽不是执委会委员，不参与决策，只负责执行，但作用重大，一是任期较长，一届6年，而且还可连任，没有限制，直到他自己不愿干或不能干（包括身体原因或被改选）为止。现任秘书长为荷兰前总检察长汉·莫若。日常工作机构为秘书处，设在荷兰海牙。秘书处设有两位重要官员，一位是行政主管，负责日常事务运转，如经费收支、召开会议等。一位是法律顾问，负责专业问题处理，如年会主题的确定、检察业务的处理等。秘书处对执委会负责，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执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听取秘书处相关工作汇报，

决定重要项目。

章程规定，国际检联属于非政府、非政治性组织（更像一个行业组织）。因此，它的会员既可以是团体会员，也可以有个人会员。只要从事检察工作，都可以申请成为会员。会员在大会上的发言不代表本国政府，属于个人观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属于团体会员，而且是创始会员，多年来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检联的工作。1998年，中国承办了第5次执委会，1999年和2017年又承办了第4届和第22届年会暨会员大会。明年4月，中国澳门将承办第57次执委会。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华介绍，国际检联的职能还是比较丰富的。国际检联还设有很多专业委员会，如司法协作、业务培训、受困检察官救济等，分别开展相关专业工作。在国际检察官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司法协作，特别是跨境犯罪防治，无疑是最常见的工作，也是每次年会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次年会上，无论是大会还是分组讨论，大家探讨的热门话题就是如何针对电信诈骗、洗钱、海盜、走私、贩毒等跨境犯罪协调行动。有的是介绍经验，有的是发表看法，有的是提出需求。为了便于协作，国际检联每年都要召开诸如亚太、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性会议。明年12月，亚太地区会议将在中国香港召开。

检察官维权，是国际检联的一项重要职责。对于身处困境的检察官，特别是因为依法履职而导致人身危险的检察官，国际检联要伸出援助之手。由于从事工作的特殊性，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国际检联一方面施加影响于相关国家，从政治社会方面给予解决，一方面对个人给予生活救济。

涉及阿富汗战争的检察官维权，有一桩事。2020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表示要对美军在阿富汗

战争期间的暴行进行调查，激起了美国的恼怒，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对国际刑事法院参与调查的两名检察官及其家属采取制裁措施。检察官们并没有被吓倒，坚定地表示将依法履职。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是国际检联的会员，国际检联执委会迅速作出反应，以国际检联的名义致函时任美国司法部部长威廉·巴尔，对蓬佩奥“点名”威胁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及其家人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谴责任何威胁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言行。此事引起了无数正义之士的赞成和声援，美国最终也没敢干什么，倒是一年之后狼狽地从阿富汗撤军。

国际检联虽然自称非政治性组织，但其行为表明政治性还是很强的，司法怎么能和政治脱钩呢？本次大会开幕式上，国际检联秘书长幽默地表示，会议使用的茶杯是“免费”的，但希望每人捐助25英镑，所得款项用来帮助需要救济的检察官。

国际检联除了温情之外，还有严厉。对于违反规则的会员，还有惩戒措施。最严厉的措施就是“清理门户”——取消会员资格。

谈到国际检联与联合国的关系，曹华介绍，它属于联合国的咨商组织（联合国周围有一批这样的国际组织）。联合国遇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可向国际检联咨询，听取意见，协商办法。

总而言之，国际检联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组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虽然每年都参与国际检联相关活动，但是人数不多，以至于国际检联秘书处因为受众少的原因没有安排中文同声传译。无论是加强中国检察官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化步伐，还是增加中国在国际论坛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应该派出更多人员参与国际检联活动。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华对本文颇有贡献）

“中国对外关系法治化”国际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本报讯 10月14日，“中国对外关系法治化”国际研讨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会议由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涉外法治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院承办。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实务部门的160余名代表通过现场参与、网络视频方式参会。

会议围绕我国推动对外关系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聚焦我国对外关系法和外国国家豁免法两大关键立法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关系法等法律的制定与出台是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提高对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成果。也是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整体布局、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增强涉外立法系统性协同性的重大举措。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在发言中说，零和博弈思维、单边主义行径、利用国内法实施不当域外措施，将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态势和对抗局面。各国应当团结合作，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应对风险挑战，维护国际秩序和促进全球发展，并在对外交往中捍卫我国利益，亟须一部全面勾勒对外工作的法律原则、制度与规则的基础性法律。中国进一步加深涉外领域的立法，反映了中国动态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形势、维护国家利益、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以及实施、适用和执行国际法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展现了中国为反对霸权主义、促进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所作的不懈努力。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国际法咨询

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表示，对外关系法标志着中国涉外法律体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外关系法完成了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治体系基本框架的系统集成；首次将实践行之有效的外交外事管理政策和内部管理制度的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开创了用法方式方法有效应对外部挑战、防范外部风险的新模式；建立了完善的“四梁八柱”配套法律体系，为对外关系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障。

美国学者、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威廉·道奇认为，外国国家豁免法不仅说明中国是“规则接受者”，也体现了中国已是“规则制定者”。该法的颁布是国家豁免相关国际法实践的重要发展，也是中国对外关系法治化的重要进展。他还充分肯定了对外关系法在对外关系法治化进程中的引领性作用。